



从西柏坡到北平——中共中央大搬迁

□ 李润波

三大战役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华北和东北三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使解放区面积和人口陡然增多，中央管理机构需要扩大，搬迁到大城市办公已成必要。于是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后，中央机关的搬迁问题立即提到议事日程。毛泽东主席根据各方意见提议，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在开完七届二中全会后迁往北平。中央机关从农村搬到城市，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

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负责搬迁指挥，杨尚昆负责具体调度，曾三负责文档整理和押送，李克农先去北平负责安全调查。杨尚昆接受任务后，立即给在北平的彭真、叶剑英等发去密电，通知他们在北平做好迎接中共中央机关大搬迁事宜。

1949年3月22日，叶剑英、李克农从北平发来电报，说北平及搬迁沿途交通警戒等一切布置就绪，党中央可以搬迁。西柏坡接到电报后，立即复电：“我们预定24日晚去涿州，请派一名负责干部到涿州等候我们。”意想不到的是，直到23日凌晨2时，预定的20辆吉普车才到齐，而计划中的100辆大卡车也只到了一部分，这就导致原定跟随吉普车行动的人员无法按时登车，部分物资和工作用器材也不能按时装车。杨尚昆非常着急，一方面要钱益民加紧催促，另一方面将情况报告周恩来。经商议决定，先用吉普车将书记处送走，其余本应随书记处第一批走的人员，等大车到后再说。预先制定的迁移和用车计划被打乱，必须立即作应变调整，重新组织。

3月23日清晨，新华社向全国发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上午，毛泽东等走向由11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一同离开了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设在乡村



《北平解放报》关于中共中央及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的号外

的最高指挥部，踏上“进京赶考”之途。这次搬迁主要担心的是安全问题，所以北平“迎接中央迁往北平组织委员会”作出周密安排：从唐县到涿州由华北军区负责，涿州到长辛店由四十二军负责，长辛店到西直门由四十一军负责，西直门到香山由李克农负责，对空警戒由刘亚楼负责。

由于忙着应付意外情况，杨尚昆无法在毛主席登车前先行开拔。拖到午饭时，大卡车还没有到齐。杨尚昆拉上伍云甫匆忙离开西柏坡，同车的还有他的二儿子杨绍明和伍云甫的儿子伍绍祖。到保定已是子夜，保定城里到处都是向平津迁移的人，饭店、旅店爆满。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家小客栈小憩。次日中午进入涿州，先检查警卫、住宿等布置，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今天要在这里安歇。

3月21日，叶剑英、李克农电报建议中央领导到涿州后改乘火车进北平。

周恩来答复，中央领导24日晚在涿州住一夜，是否坐火车不确定，可作两手准备。据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报告，从涿州到清华园共12站，全程60公里，2小时可到达。

23日午饭后，中央五大书记开始登车。11点，车队告别欢送人群，浩浩荡荡北上，经灵寿、行唐、曲阳，当晚住在唐县城东淑闾村。毛主席住在农民李大明家里，睡在用门板搭的简易床上。

24日一早，北平市长叶剑英从北平打来电话，建议中央领导由涿州改乘火车进城，原因是，从长辛店乘汽车到南苑机场，必须从广安门进城，然后由西直门出去，这段路面很差，所以建议乘火车。周恩来当即表示同意。车队上午9点继续出发，中午在保定吃午饭，下午3点到涿州，晚上住在四十二军军部。叶剑英、滕代远从北平来到涿州迎接。

25日凌晨2时，众领袖从涿州登上

火车，车开得很慢，为的是掌握好时间，保证清晨6时到达北平西郊的清华园车站。火车到站后，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已在车站迎接。随后，他们乘吉普车前往预先安排的颐和园益寿堂休息。到地方一看，五大书记休息的屋子冷清清、空荡荡，既没有床铺也没有沙发，只有用木凳拼搭成的铺位。经查得知，是中央社会部的保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提前把园内的人给清出去了，所以领袖们到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几位最高领袖就在这里凑合着午饭。

周恩来将杨尚昆找来，要他马上到西苑机场对入城仪式作最后的现场检查。为保障首长安全抵达北平，社会部部长李克农提前组织了一支150多人的便衣保卫队，暗中对首长行程进行保护。

下午3时，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这位数百万雄师的统帅，虽然几年来指挥着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但一直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刻亲临部队检阅，心情非常好。接受检阅的有3个步兵团、2个炮兵团和1个坦克营。在机场，毛主席还受到北平社会各界人士的欢迎，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爱国人士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李济深等一一握手，之后又与前来迎接的傅作义合影留念，然后到颐和园佛香阁休息，第二天搬进双清别墅居住了80天。在那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作战部队发布了作战命令，指挥了空前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追歼白崇禧集团战役。6月15日进驻中南海丰泽园，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也同时进驻中南海。

中国共产党首脑及核心机关进驻北平，标志着新中国即将诞生，一个新的时代从此开始！

（摘自2009年第5期《中国档案》）

不可沽名学霸王 毛泽东点评项羽：

□ 曹应旺

年前楚汉之争的历史故事，用的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当今大计。

项羽和刘邦同是胸怀大志的人物。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游会稽、渡浙江的壮观场面，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一起看到了。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项梁忙用手掩住项羽的口说：不要妄言，被秦人听见了要诛灭九族啊！无独有偶，《史记·高祖本纪》也有一段大抵相同的记载：刘邦为普通老百姓时，常到秦朝都城咸阳服役役，见到秦始皇出官时的壮观场面，“喟然太息曰：‘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陈胜、吴广起义反抗暴秦，天下响应者众。项梁、项羽与刘邦、萧何也树起了抗秦大旗。陈胜、吴广兵败，其后项梁阵亡，项羽和刘邦成为抗秦两大首领。他们率军分进之前，楚怀王约定“先入关者王之”。结果，只有10万兵力势弱的刘邦先入关，不敢“王之”；拥有40万大军势强的项羽后入关，挟势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此后，逐步形成楚汉相争的局面。

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毛泽东自然想到项羽是一个不能将胜势一鼓作气保持到底的首领，是一个沽名钓誉、优柔寡断的首领。倘若项羽歼灭秦军主力之后，乘胜以40万兵力消灭刘邦，刘邦就不会有喘息的机会。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三个月前，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题目就是《将革命进行到底》。

在即将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

毛泽东讲了一则古希腊的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毛泽东认为：“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毛泽东号召“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他最后写道：“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是用形象的诗的语言凝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

（摘自2016年第12期《党史博览》，原标题为《“不可沽名学霸王”——毛泽东点评项羽、刘邦》）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得知南京解放的消息，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接楚汉之争，挥毫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著名诗篇：“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诗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思的是2000多



□ 李东方

为什么党章规定申请入党者要年满十八岁？这一规定又是从何时开始的？下面结合党的历史和党章的发展历程，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解答。

党成立初期，各项规章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党员标准还比较宽泛，对入党者的年龄并没有明确规定。1927年6月，五大党章规定“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这是党章第一次对入党者的年龄作出明确规定。这一规定并没有实

行多久，一年后，六大党章即取消了这一规定。1945年6月，七大党章又重新规定了入党者的年龄，即“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受为党员”。1945年5月14日，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曾对这一规定作了说明：“一个人一般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确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针对已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但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如果党组织认为“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的话，可以“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才能转为正式党员。此后，以十八岁作为入党者的最低年龄限制，为历届党章

所沿用。

在革命战争年代，陈丕显、萧华等几个比较著名的“红小鬼”，入党时都不满十八岁。陈丕显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才15岁。萧华1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3月被调入中国工农红军，7月，萧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只有14岁。虽然年龄小，但“红小鬼”们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革命斗争水平却不低。陈丕显13岁便在家乡福建上杭县从事共青团的创建工作，18岁已经成为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19岁成为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萧华13岁便担任少共兴

国县委书记，17岁被任命为“少共国际师”师政治委员，其组织才能深得毛泽东称赞。

新中国成立以后，根据《宪法》规定，十八岁以上公民是成年人。一个人在十八岁以后，才具备了比较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政治判断能力，在思想和政治上才比较成熟，才能确定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奋斗目标 and 志向。党章规定入党者必须年满十八岁，这既符合宪法对成年人的法律规定，也是党提升党员标准，保证党员质量的具体体现。

（摘自2017年第19期《四川党的建设》）

宣布“定都北平”的一次重要会议

□ 李自华 王 蕾

1949年2月下旬，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刚到西柏坡便携夫人朱仲丽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就定都一事征询了王稼祥的意见。据朱仲丽回忆：“毛主席吸一口烟，换了一个坐姿问稼祥：‘我们定都何处？你有什么意见？’历代皇帝定京城于西安、南京、北京，我们呢？”稼祥沉思片刻回道：‘是不是定在北京？’‘你的理由？’‘我认为北京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南京太靠东南，西安似乎偏西了一点儿。’稼祥持重地回答。‘嗯，有道理。’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王稼祥关于国都选址北平的意见，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制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各项方针政策的极其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

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至此，新中国定都北平一事，已在党内形成一致的意见。

1949年3月25日，叶剑英前往涿县迎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北平。叶剑英介绍了北平和平解放及接管的情况，并补充说：“北平和平解放时，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的政府。”毛泽东说：“他们不知道我们已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定都北平在党内形成一致意见后，下一步工作就是要使社会各界慢慢知晓这一计划，并最终在新政协会议上顺利通过。

（摘自2012年第8期《北京档案》，原标题为《毛泽东与新中国定都北平的重要决策》）

北京党校：我党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

□ 李庆刚

党校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政治优势，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样重视党校。我们党自成立后不久就决定成立党校。1924年5月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通过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有史料可证，这次会议至1925年第二次扩大会议期间，我们党开办了安源党校和北京党校。这两所党校在早期党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北京党校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由罗亦农担任校长。1924年秋，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在与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委员长（不久称书记）赵世炎交谈工作时指出，干部训练非常重要，我们须赶快为党的工作的大发展准备大批的基层和中级领导干部。但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的欠缺，我们还无从知道这些训练班的具体情况。1925年9月在安源党校被迫停办的时候，北京党校在李大钊主持下由赵世炎具体负责筹办。

北京党校的校址选在西城区新街口蒋养房胡同一所两进的四合院内，党校对外公开名称是“北京职业补习学校”，办学资金由李大钊通过苏联大使加拉罕加以解决。校长由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宣传部长罗亦农担任。《罗亦农同志传》记述：“是年十月，中央召集扩大会议于

北京，亦农同志代表粤区出席。此时，中央深感干部的缺乏，决定开办短期党校。故扩大会后，即令亦农同志主持党校工作。”罗亦农主持的就是北京党校工作。这段话也表明，北京党校是党中央创办的第一所高级党校，其地位和意义当然是重大的。

（摘自2016年3月7日《北京日报》）

